原翻译文件地址：<https://maozhuyi.home.blog/2020/10/22/%e8%ae%ba%e5%9f%8e%e5%b8%82%e6%b8%b8%e5%87%bb%e9%98%9f/>

原文地址：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119035230/https://struggle-sessions.com/2019/10/07/on-the-urban-guerrilla/>

鉴于中文翻译原本质量过差，特此个人重译。

**论城市游击队**

Cathal  
二〇一九年十月

“至于欧洲的武装行动，我们看到了持久的武装斗争。它们是客观现实的表达。因此，任务不是谴责他们，而是要理解、研究和分析他们，看看他们如何表达旧欧洲也存在革命形势的事实。除此之外，还要看到那些拿起武器的人，他们认识到这是夺取权力的唯一途径。这是对修正主义的有力打击，因为在欧洲，修正主义的堡垒之一，修正主义开始被抛弃。无论斗争达到什么水平，还有多少待解决的问题，这些斗争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与贡萨罗主席的访谈》，1988年

引言

关于人民战争理论，它的普遍性及其在地球上每个国家的适用性，都已经有很多讨论。对峙双方的辩手都将在辩论中谴责和捍卫城市游击战的经验。我们打算以不同的方式，即对数场重要的欧洲城市游击运动进行更详细的阐述，来讨论这个问题。为了更清楚地表明我们所坚持的毛主义的唯一立场：人民战争是普适的，我们建议研究挪威和德国的公开文件以对这一问题有更多了解。

我们发现，许多谈论城市游击队的人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要么对特定现象的理解不足，要么对马列毛主义的理解不足。这个问题适合于各种右翼和左翼机会主义的解释。

学习而非谴责

右倾机会主义者们急于彻底贬损欧洲城市游击战的整个时期。他们坚持认为，客观条件就是不允许，好像意识形态、毛主义本身只是小事一桩，只要存在“革命形势”，持有任何想法的任何人都可以革命——而不需要意识形态、战术和战略。更重要的是，站在右倾立场上的批评家忽视了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同时，从过去的失败里吸取教训的必要性。

最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NDFP）网站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所持的右派观点。菲民阵因其在国际上支援修正主义的行径而受毛主义者的批评。为了指出这些最常见的右派立场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看一下它在哪里是正确的。确实，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直到1980年左右之前都没有进入战略进攻时期，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城市游击运动都达到其顶峰，包括诸如爱尔兰、巴斯克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等。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存在的武装集团，一方面受到条件的限制，同时另一方面也是客观条件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进攻阶段急速跨越式发展的产物。尽管如此，贡萨罗主席坚持认为这些团体的存在说明了作为修正主义堡垒，旧欧洲的现存革命形势，他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自然，我们坚持认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进攻时代为各国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无一例外。

历史上，阿瓦基安和他的支持者对城市游击战的经验进行了全面的否定，这并不是为了坚持群众路线（他们已经明确拒绝），也不是为了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他们一直未能系统性的提供），而是为了灌输他们的长期合法斗争和短期暴动理论——至少可以说，这个观点是教条和过时的，不过这一点也是证明美国革命共产党从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毛党的主要特征之一。尽管这种观点早在80年代就在美革共控制的《赢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杂志中流传，并被当作默认的常识性立场。这一观点有别于在本文开头的贡萨罗主席所表达的革命乐观主义。美国毛主义者已经直言不讳地表示需要克服阿瓦基安主义的残余，这些残余仍然困扰着人们，仍然在右倾机会主义者中流行。

马列毛主义已经具备了所有必要的理论工具，对城市游击队的经验进行了冷静的分析、总结和综合。他们做对了什么？导致它们消亡的主要的理论和思想漏洞是什么？换句话说，它们的内部矛盾是什么？他们是如何正确和错误地应对自己的情况的？毛主义使我们能够避免不少城市游击队产生问题的地方，而非被其拖后腿。

通过这项简短的研究，而非全面贬损，某些品质就显现出来了，这些品质对于任何主张在帝国主义中心进行武装斗争的人而言，无论其立场如何，都是最有价值的。只有那些把群众的武装斗争理论化（即人民战争）的人，才能克服城市游击队的错误，达到更高的高度。相反地，即使只是错误的战略，如关于暴动的教条主义观点，也应当毫不妥协地被认识为试图取消武装斗争。我们的目的是坚持认为，双方的批评者都是从对城市游击的准确研究出发，而不是出于资产阶级的鬼话或对武装斗争的恐惧。城市游击的真相一直被浪漫主义和悲观主义所掩盖。让我们至少拨清一些迷雾。

意大利红色旅

“我们一直在打击人民的敌人，我们一直通过大量的斗争运动打击他们。”

——红色旅，米兰，1971

作为毛主义者，我们坚持意识形态不可放弃，所以在我们能够研究的各种组织中，一定要从可以说发展出了最好的意识形态的城市游击队开始。红色旅在明确表达他们的理论，他们反对修正主义的立场等方面要好得多，也因此他们从欧洲的所有“马列主义”城市游击队中脱颖而出，因为他们与意大利无产阶级有着明确的、无可否认的联系，也因为他们与地上活动着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和劳工斗争有串联，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的汽车工厂里。红色旅不像他们的德国同志红军派那样主要由学生、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组成，相反，他们主要是从工厂工人转变来的士兵。

对游击中心主义的控告和它真正的劣根

红色旅不是游击中心主义者，他们甚至十分明确的阐明过。相反，他们依靠工厂基层作为“阶级斗争的直接表现”，这也为他们组织增加了很大的力量。尽管如此，他们依旧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要么受到游击中心主义的影响，要么受到作为游击中心主义反面教材的团体的影响。

红色旅从第三世界的多钟渠道汲取斗争灵感，他们有时会因此陷入折中主义——他们对意大利共产党采取了正确且强硬的态度，同时也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即把对能把谁团结起来的主要考虑，完全建立在对议会外武装斗争支持的基础上——而无视战术、战略和意识形态。即使是那些对他们叫喊最凶的批评者，只要这些人在理论上对武装斗争有某种模糊的支持，红色旅也拒绝指责。必须把这一点认识为没让政治指挥枪——这一错误类似于游击中心理论的主要缺点。

红色旅深受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Tupamaros）的影响，乌拉圭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与毛主义者不同，图帕马罗斯将城市游击斗争作为主要斗争。在他们的辩护中，我们可以看出，毛主义在拉丁美洲还没有被认识到是一种力量，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坚持，在20世纪60年代秘鲁同志在他们的党出现左倾时，谴责游击中心战略是正确的。贡萨罗主席所持有的正确路线是重建秘鲁共产党并开始准备持久人民战争。图帕马罗斯的错误在于他们对客观条件作出了正确的反应，却没有对他们的主观条件作适当的准备（这与城市游击队的解散者对欧洲经验的描述正好相反），实质上，这也是红色旅的根本性错误。对战后意大利的任何研究都表明，武装斗争的条件已经处处成熟；红色旅的错误不是武装斗争。

过度借鉴图帕马罗斯和巴西人卡洛斯·马里盖拉的例子必然会破坏红色旅的潜力。尽管有这种局限性，由于对无产阶级的依赖，红色旅仍完成了很多伟大而成功的行动，这些行动依靠无产阶级的支持，且其在行动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无产阶级的支持。

通过武装对抗赢得大众支持

甚至在红色旅成立之前，他们的前身无产阶级左派（Sinistra Proletaria，SP）就在为无产阶级家庭组织住房斗争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与修正主义者和合法左翼不同，无产阶级左派组织无产家庭无视使他们迷失和陷入困境的法律途径，转而与阶级敌人进行直接的和武装的对抗。他们教导群众住房斗争是无产阶级夺取权力的斗争的一部分，并以此巩固他们对住房的占领，并准备应对警察的进犯，这导致很多警察都住院了。与修正主义者们的表演和布道相反，这些策略非但没有导致群众疏离的不赞成，反而增加了群众的支持，最后，住房委员会让步了，并把房子给了工人们。无产阶级左派评论道：

“他们[无产阶级左派在住房斗争中成立的工人委员会]战胜了修正主义者和所有其他鼓吹温和、只想依靠谈判、指责斗争中的人们是极端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人民的假朋友’。各路修正主义者都说我们会被打败！但是我们成功了！人民的新法律获得了胜利！”[1]

当代对红色旅的评价

我们发现关于红色旅的英文文献中，少有从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探讨其历史和经验的；我们承认，我们还没有完全研究过这一点，且我们必须与我们读到的内容（那些英文文献的观点）做斗争。最近加拿大学者、修正主义者约书亚·穆法瓦德-保罗（JMP）写了篇短文，尽管我们将讨论其中的缺点，但是它也有优点。在对Kersplebadeb和AK出版社（Kersplebadeb and AK press）出版的两本书：《打一教百》和《1978：一个阶级斗争的新阶段》的反思中，他正确地强调了红色旅所维持的群众联系，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左翼学者只关注意大利自治运动的倾向，这使它成为其最好的文章之一。但我们仍然面临着某些误解或可能的混淆，这值得纠正。[2]

必须纠正的第一个错误是，认为红色旅试图发动他们从未宣称要发动的“人民战争”的观点。通过像“持续革命战争”或者“持续武装斗争”这样的说法，他们与毛主义的持久人民战争的理论有重叠或者接近，但这种程度不足以将他们的武装斗争称为真正的持久人民战争，甚至当成是在持久人民战争的范围和方法方面发起它的一次尝试都不合适。我们做出一些让步，承认这样一种观点：红色旅创造性地应用理论，试图将类似于城市持久人民战争的东西理论化，但由于一些理论错误，他们没能正确地完成这一工作。我们将在下面概述这些理论错误。

毛主义的观点是，持久人民战争必须由共产党发起，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持久人民战争是不可能的，完全重建的党有尽快发动持久人民战争的历史责任。红色旅的情况并非如此。在他们的辩护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武装斗争并不总是持久人民战争，即便后者总是包含着前者——武装斗争可以先于党和持久人民战争存在，历史证明这是必然的。约书亚·穆法瓦德-保罗坚持认为，缺少党是红色旅的阿基里斯之踵（致命弱点），这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红色旅正在或者试图开展持久人民战争，这是缺乏支持论据的。我只想说，没有党就不可能有对真正可信的持久人民战争的尝试，但是肯定会有帝国主义中心的武装斗争经验，其中又有很多有用的教训，在这方面需要考虑的是，将现存武装斗争转化为人民战争之必要性，所以，党又是一个先决条件。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即使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也会发生武装斗争，尽管发生的频率要低得多。这些爆发必须用于发动持久人民战争，而非糊涂的将它作为持久人民战争的替代品。

红色旅认为它可以通过武装斗争来建设党，这并非是不正确的，很多党都是通过武装斗争建设起来的，其中显著的有中共和秘共。起初，中共的成立会议上只有很少的代表，在全中国只有不到100个成员，按照毛的说法（包括他自己在内），没人能回答在中国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但是党仍然经历了指数级的扩张以及几近毁灭和劫后复苏——这全都是在通过武装斗争和最终的持久人民战争的条件下进行的。最显著的区别是，中共已经认识到并把自己确立为先锋党。

另一方面，红色旅没有这种党的条件。我们遇到的事实是，他们没有试图“通过持久人民战争建设党”，而是试图主要通过城市游击队运动的方式建立或者重建党。在此，我们必须理解两个概念，建设（building）的概念和建立/重建（constitution/reconstitution）的概念。所有的党都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来建设自己，没有任何党在开展任何形式的革命斗争后能够保持之前的质和量，因为一旦开始革命斗争，任何健康的革命党都会在党的建设过程中成长和丰富，这是贯穿整个党的存在的不断发展的过程。

另一方面，建立/重建并不是贯穿党的整个生命的不断的、重复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而是其得以持续“建设”的必要前提，建立/重建一旦结束，“建设”就立即开始。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不是语义学问题，而是一个原则性错误、一个蒙昧主义问题，无论是否有意，都倾向于已破产的“通过长期的合法斗争积蓄力量”的观念。可以说，一个尚未建好的党，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无法进行建设，直到通过建立/重建，实现从非党组织到党，从党的雏形到真正的党的飞跃——这也涉及将质的提高当做是首要考虑因素。

为了使问题更明确，党的建设只能发生在党存在的条件下，在这个条件之前，组织不是“党的建设”；它正将其自身建立或重建为一个党。在我们看来，JMP的方案是一个随意得出的结论，限制了我们对红色旅的错误之根源的探讨，这个根源是他们所寻求的是一种不现实的、不可能的东西——在发动他们有时称之为“持久革命战争”后，他们再建立或重建自己。此外，在武装斗争的条件下这也许有可能重建共产党，然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拥有有关党的正确概念，而这是红色旅所没有的。

这个错误的概念，再加上无意识的受游击中心主义的影响，严重破坏了他们的在左翼城市游击队中无可比拟的潜力。通过战争来建设党是一个完全合理的目标，这个目标在几乎所有的经验中都被证明是可行的，但是在没有建立党的情况下领导革命战争，是不可能为无产阶级的夺权取得任何长期成功的。

在文章的更新版本中，JMP改进了他的评价，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说清楚我们的分歧，因为这对分析红色旅非常重要，他总结道：

“对于那些熟悉秘鲁共产党‘党的军事化’概念的人来说，这甚至比这个概念还要退一步，因为这似乎是‘前党组织的军事化’[编者：基于有关这种比较的讨论，我应澄清，这主要是一种修饰上的差别，旨在表明当代的毛主义者对人民战争的理解优于红色旅对此的理解。很明确，在它的早期阶段，红色旅对其前党组织的“军事化”事实上是成功的，并为其带来了力量。确切的问题在于，当红色旅进入了战略防御的军事阶段，它还没有党的机构，并希望在内战中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更准确的说，在没有先锋党建立计划的情况下，红色旅正式进入了军事阶段。]在1980年代，也许因为缺乏一个预先建成的可以控制枪的党——而相反的过程是枪在找党——红色旅的不同纵队发生了分裂，因此他们在受到国家的反革命攻势时更加脆弱。不过，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这种教训，是因为他们拥有革命遗产。我们应该从那些追求革命的失败运动中学习更多，而不是那些因为从未尝试所以从未失败的运动中学习。”[3]

我们认为，JMP并不熟悉党的军事化，至少不够熟悉。当然，他说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必须指出和纠正的是，对党的军事化这一理论本身的混淆。红色旅构想了党和军队的完全合并，强行使两种截然不同的工具合二为一，这是他们在前党组织时所遵循的模式，也是对他们未来的党的看法。这与党的军事化是完全不相容的。正如秘鲁共产党所正确坚持的那样，党的军事化是为了领导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调整和修改。不论是秘共的理论亦或是他们军事化的历史经验都认为党和军队不可以结合成一体——即红色旅所理论化的战斗共产党。与这种构想和JMP的错误理解相反，秘鲁共产党构想并实现了军事化的共产党，即围绕在党的周围同心圆一般地建设党的军队——比党自身更大。党是最高政治指挥中心，少数人聚集在那里，通过围绕着党而建立起来的人数比党多得多的军队，它能够开展其群众工作。关于这个话题的更多内容，我们推荐巴西同志的作品和一位前奥斯汀红卫兵同志的讲话，他们正是在呼吁对处于雏形中的党进行军事化。[4]

JMP的文章中值得关注的是他的对于前党组织的军事化对红色旅有利，而非有害这一认识，然而他没能明确肯定党的军事化是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组成部分。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见解，因为，毫无疑问，一个非军事化的团体肯定无法做到红色旅所做的事情。这也被历史证明了，除其他事外，其中最突出的是红色旅很少被渗透。虽然大多数的修正主义组织，其中最主要是意共，坚持认为红色旅是警察的一个阴谋，充满了线人和渗透——事实恰恰相反，意共才是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中含有美国中情局特工的那个，这些特工通过诡计设法提供情报，导致意共兄弟党派中数以百计拉丁美洲人的死亡。[《打一教百》]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美国的修正主义者中，他们坚持秘密行动的毛主义者是由执行现代反间谍活动的特工组成，这是毫无根据的指控，考虑到这些修正主义者享有警察保护，几乎从未面临重大指控或镇压，而那些以某种方式与毛主义运动有关联的人面临着近乎连续不断的指控和国家镇压，包括企图暗杀和不计其数的构陷、诱捕和监视等等。我们看到的是，那些由于组织而最易受渗透的趋于不会与政府发生冲突，也最少被分析；针对那些组织起来反对渗透和面临镇压的人，却去指控他们是国家特工，当然，这些指控永远没有任何事实证明。

只有部分正确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把我们对红色旅(或任何城市游击队)的认识超越一般的问题，我们就必须理解军事化的共产党与党军合并的区别，建立/重建和建设之间的区别。我们必须捍卫通过持久人民战争建设军事化的共产党；我们决不能把党和军队混为一个整体。

为了进一步说明红色旅的错误，我们必须研究1975年的文件《对国家心脏的猛击》，它试图从理论上证明把党和军队压缩为一个整体是合理的，当然，通过武装斗争来建设党是要推迟到以后的：

“游击战争的群众路线并不意味着，像某些人解释的那样，‘在武装斗争的地带组织群众运动’或至少当下并不是这样。”

“在不久的将来，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仍然是建成战斗性的党，作为‘客观的’革命阶级阶层的政治和军事所需要的真正解释者，在革命战争的众多战线上发展全阶级的战斗组织。”[5]

红色旅简洁地暴露了他们的主要错误，比当代或历史上的任何批评家都要好。在武装斗争地带组织群众运动是一项需要红军的严谨任务，只有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军队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党全方面地指挥军队，它是军事化的但又是与军队不同的组织，这就是秘鲁共产党的总政治路线中所概述的革命三大工具的同心建设。

相反，红色旅把党和军队混为一个整体，试图把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作为一个追求，而不是作为一种客观必要性，从而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伏笔——游击战争或任何其他时期的群众路线都依赖于这一原则：群众创造历史，而党作为杠杆，必须领导群众。人民战争这样就纠正了红色旅的错误，剩下的就是从他们的成功中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从红色旅吸取哪些必要的教训呢

首先，要了解他们对现代修正主义意共、意共与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合作和在国际上的政治立场的观点。红色旅是无产阶级中一股真正的力量，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工厂内行动，直接反对企图破坏或粉碎车间斗争的意共干部，他们也反对残存的法西斯主义管理者和所有者，这在意大利很常见。这反映了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斗争的主要危险，认识到意大利共产党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大的、最强的没有国家政权的修正主义组织之一。现代修正主义与革命的矛盾创造了红色旅，没有马列毛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就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在统一战线上就会屈服于上述折衷主义。在这一切中最闪耀的一点是，红色旅作为撬动无产阶级的这一杠杆的能力，在反对修正主义统治和改良主义方面采取了大胆的、得到了支持的行动。

在军事上，红色旅谴责了第三国际的暴动战略和游击中心主义，这是正确的。红色旅从意大利武装斗争的悠久传统中发展而来。这些斗争包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斗争，和接纳了修正主义后，大量的意共干部、基层组织以及激进的工人民兵仍然拒绝解除武装。它们具有持久的特点。对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们来说，武装斗争并不陌生，这使得旧共产党的背叛更具毁灭性。反法西斯抵抗战争未能发展成为人民战争，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是陶里亚蒂和其他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叛徒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清楚，被现代右倾机会主义者贴上“冒险主义”的红色旅的行动实际上是红色旅的功劳。他们的目标通常是最受唾骂的，有时他们会审判人民的敌人，树立典型，作为有意识的宣传行动，比如，剃掉一个法西斯管理者的头，把他绑在一家汽车厂外的旗杆上，脖子上挂个牌子。这些活动增强了斗争工人的支持，加强了他们的信心。数百名工人举着红旗在管理者成为红色旅目标的工厂内游行的情况并不少见。红色旅认识到，意大利无产阶级寻求武装斗争，而这种愿望正面临着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扼杀企图。

对试图在工人阶级社区和工厂里打击和抵制法西斯影响的现代反法西斯主义者来说，红色旅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教训。在二战后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他们作为最激进、最发达、最有力的反法西斯力量之一脱颖而出。然而帝国主义国家的当代左翼分子却非常乐意穿肮脏的无政府主义尿布，不管现实给了他们多少次迎头痛击。

武装宣传必须与“行动宣传”划清界限。前者利用革命暴力，争取群众支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形式。后者只是希望在没有组织表达的条件下，有组织地激发类似行为。我们可以理解，红色旅倾向于前者，而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后者。我们可以在秘鲁共产党对偷牛贼和强奸犯的早期审判中找到武装宣传的历史论据，这些人在人民法院完成审判后被处决。这些例子无一例外地出现在迄今每一场人民战争中，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没有发起持久人民战争的党和组织也能够为群众进行这样的审判和惩罚。必须理解，对罪犯的个别审判和惩罚本身并不会消除这种罪行的发生；必须明白，在获得政权和革命政府能够实施统治之前，仍会有偷牛和强奸行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行为将继续下去，一旦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这些罪行就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革命的对象。这种讨论的价值在于，这种惩罚的作用是动员和激励群众参加和支持革命，对反人民犯罪的威慑作用只是一种附带好处。支配这一点的运动定律（laws of motion）只会加强对持久人民战争普遍适用的论据。红色旅特别擅长武装宣传，认为这是任何游击队斗争打响第一枪的手段。

红色旅研究革命理论的真正意图是将普遍性应用于意大利的具体情况；他们对意大利和世界的许多分析领先于其时代，因此对所有革命者都有价值，而其他理论则缺乏彻底的科学性。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使用陈腐的教条，坚决地同一切企图用无休止的合法主义来扼杀革命的人决裂，甚至他们的失败也比合法主义者（包括自治主义者）所谓的成功更有价值。红色旅没有在他们的理论上走得足够远，无法找到正确的意识形态和军事战略。他们所缺乏的正是完全理论化马列毛主义的毛主义，他们只能走到这一步，创造性地运用尽管是折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证明了在欧洲进行武装斗争的能力。与他们的成功相关的是，意大利是欧洲列强中更落后的国家之一；它仍然保持着法西斯时期天主教会培养的的高度反动，尤其是对妇女，在南部依旧存在半封建因素，以及广泛存在的对北迁到工厂工作的南方人的种族主义。这些条件有助于红色旅成为最成功的城市游击队之一。仅凭意大利的这些特点并不能使红色旅与众不同，是他们坚定的无产阶级倾向，和他们理论化和证明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斗争问题的渴望让他们与众不同。建议关心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武装斗争的人好好地研究和分析红色旅，这并不是什么大的飞跃；这对于使他们免受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攻击是有意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试图取消帝国主义中心的武装斗争。在任何分析中，我们都应该认为红色旅站在街垒的正确的一边。他们的错误是革命者尝试新事物时的错误。我们应该在持久人民战争的脉络中珍视它，就像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对巴黎公社的观点。

红军派

关于我们的办法，我们已没有更多的话要对你们说了，就像我们的行动计划一样。——你们这些混蛋！……你说冒险主义是什么意思？那次只能怪告密者，不管怎么说。”

——红军派，《建立红军》，1970年

红军派引用的毛泽东比引用的其他革命者多得多，他们的某些理论源于毛泽东。其中的主要内容最好理解为对正确思想的不正确应用，或以错误的方式去做正确的事情。如红军派那样，坚持把实践放在知识积累中的首要地位是正确的，这对于发动战争来说也一样适用——因为这一真理，是理解红军派作为武装斗争的伟大试验的唯一途径。从毛主义团结-斗争-团结的原则出发，红军派认为，在没有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不可能将德国工人阶级与自己和进步的或革命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资产阶级的观点，有时也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是，红军派幼稚、浮躁，更像是一个帮派；没有什么比这更偏离事实的了，但凡粗略地审视一下他们的理论，就可以看出他们高度关注马列主义理论，在伟人们中强调了毛。他们并非不关心具体情况，而是直接从对这些情况的理解出发，为自己的论点进行了高质量的理论辩护。

不像红色旅，红军派对维持和加强他们在德国无产阶级中的基础并不怎么关心，他们在他们最重要的文件《城市游击队概念》中也承认了这一点：“我们最初的组织观念是把城市游击队和基层工作联系起来的。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在社区和工厂工作……学习。很明显，这行不通。”[6]

通过否定三大法则（三大法宝）以及紧随其后对毛主义的否定，红军派试图从理论上为军民分离辩护，而不是像红色旅那样找到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这一观点将持续不断的损害红军派，并且会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他们与无产阶级的分离。

作为最有据可查的城市游击战团体之一，红军派可能无法得到应有的对待，我们只能交出自己最有限的概况。首先是它的特点，我们必须考察红军派的战士自我牺牲的一员，甚至放弃自己为人父母的权利，就像古德伦·恩斯林和乌尔丽克·迈因霍夫那样，她们都是母亲，被迫在积极的母亲角色还是投身于地下战士的生活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从这一点出发，因为它生动地说明了当时德国女性的普遍思想，即武装斗争是确保一个光明未来的唯一途径。组成西德工业和政府首脑的前上层法西斯分子的存在强化了这一思想。对于构成红军派的激进一代来说，战前政府和战后政府之间有着很大的连续性。传统的共产党被不断推行的法西斯政策所取缔和摧毁，这一事实只教会了年轻人一件事：枪是唯一的政治手段。对这此表示同情是理解红军派的必要条件，这一条件对任何想正确对待他们的批评意见来说，是必要的。